

我们万众一心向前进

——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110周年

马勇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云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很多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指出，英雄烈士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弘扬英烈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成为时代赋予烈士褒扬工作的重要使命任务。

今年2月15日，是人民音乐家聂耳(1912年2月15日—1935年7月17日)诞辰110周年。聂耳短暂的一生，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和传唱不衰的音乐作品。特别是他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饱含爱国主义豪情，准确表达了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不朽的经典乐曲，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象征。聂耳是第一个在歌曲中塑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光辉形象的作曲家，是我国当之无愧的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重温聂耳的故事，传唱他的作品，感悟他的精神，对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激励、鼓舞作用。

为国而歌的爱国者

聂耳是富于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音乐家，是以音乐为武器的忠于祖国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聂耳在少年时代就立志“要写一首中国的《马赛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来自少年聂耳的初心。1935年2月，田汉在被捕前匆匆写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后来反复回忆：“当时聂耳正在准备去日本，知道了《风云儿女》有一首主题歌时，就主动来找我‘抢’任务，说这首歌一定要让他谱曲……我和师毅、慧敏为他送行时，他还表示这支歌曲定稿后一定尽快寄回，不会延误影片的摄制。”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大肆镇压革命人民。聂耳亲眼看着无数革命者和战友倒在了血泊里，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他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这些往事，都一幕一幕呈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满腔的激情如火山般喷发出来。



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聂耳



1928年聂耳(右)加入共青团后与团小组组长邓象珪合影

他在自述中写道：“我写这首曲子的时候，感情很激动，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绪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一气呵成，两夜工夫就写好了。”他把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全部凝聚在这首杰出的歌曲之中。不久，聂耳从东京寄回修改后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1935年5月9日，在光复组织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袁牧之、金山、顾梦鹤、施超等7个演员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即《风云儿女》电影主题歌)。司徒慧敏回忆：“我们几个当时的年轻人，有爱唱歌的青年盛家伦，有当年演过《大路》的郑君里，有正在排演《娜拉》的金山，有《风云儿女》的演员顾梦鹤，有新演员兼场记员施超，把不善唱歌的我也灌充充数地凑上去，共六七个人。在吕骥、任光等同志的鼓励下，我们组成一个小小的临时合唱队，经过几天的练习，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到今天已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作品一经诞生，立即在祖国大地上到处传唱，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音，充分反映了聂耳把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当作最高利益的思想境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确定其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九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敢于斗争的勇士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

聂耳是一个富有斗争精神的人。在昆明求实小学读书期间，聂耳勤奋刻苦学习，各科成绩名列全班第一，被选为自治会会长。他曾率同学积极支持校方与霸占校舍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学校为此颁发书面奖状表扬聂耳的正义行为。1925年，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和学生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反帝浪潮。聂耳积极投身反抗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五卅”受难工人的宣传和募捐演出等革命活动。

1927年8月底，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里，聂耳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进步书籍和革命青年，这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他在《我之人生观》一文中写道：“恶劣的社会使我和我们有为的青年抗争了……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



聂耳演奏小提琴

应新社会的旧礼教……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聂耳并未退缩，他积极参加印制张贴传单和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

1928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聂耳参加云南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共、清党”镇压，聂耳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宣传队，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1930年，为躲避敌人的追捕，聂耳从昆明转移到上海，结识了田汉，参加中国反帝大同盟，继续投身于革命斗争。

聂耳20岁就树立了为改造社会而担当责任的强烈使命感。1932年6月，聂耳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意有任何的障碍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为改造社会而生，要做出伟大的事业，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聂耳在23岁就成了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音乐家，谱写了一首首呼唤民众抗日的歌曲，点燃了亿万群众内心的火热，激励人民团结奋斗，抗击日寇，保卫国家。

为民呐喊的“人民音乐家”

聂耳的艺术创作来源于人民生活，关怀劳苦大众，紧贴时代脉搏。他经常深入劳苦大众中，了解人民的疾苦和思

想，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真切表达时代呼声和劳苦大众心声。田汉说，聂耳“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要求”。聂耳为人民而歌，他创作了《开矿歌》《饥寒交迫歌》《码头工人歌》《大路歌》《毕业歌》《告别南洋》《梅娘曲》《铁路下的歌女》等一系列大众的、民族性的歌曲。聂耳的歌，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体现出他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关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切情感。

聂耳爱国爱民、努力奋斗、不屈不挠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聂耳在音乐实践中，创造了诸多第一：第一个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革命者，第一个在歌曲中创造了中国无产阶级形象的作曲家，第一个电影音乐家和用群众歌曲的形式传达革命理想的作曲家，第一个用儿童歌曲的形式呼唤新中国的作曲家……聂耳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严肃的思想性、高昂的民族精神和卓越的艺术创造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探索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2009年，聂耳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9年，《义勇军进行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在继往开来的新征程上，我们继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前进！前进！(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为官当如陈宏谋

谢建东 王震

陈宏谋(1696—1771年)，字汝咨，曾用名弘谋，因避乾隆帝“弘历”之名讳而改名宏谋。临桂(今桂林)人，是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任云南布政使，是清代在云南任过且为官清廉又能干事成事的典范。陈宏谋是属于清代中国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的。他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18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汉族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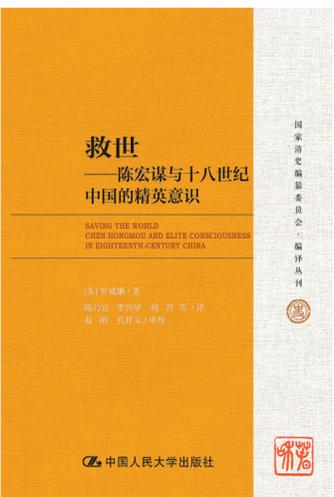
清正廉洁、敢于任事、干事成事的好官

陈宏谋由科举入仕，先任吏部郎中等职，在朝中历练，后外放任职。雍正十一年(1733年)提拔为云南布政使，乾隆三年(1738年)授直隶天津道，在云南任职不超过6年，在其长达30年的外任履历中并不算长，但相对于其多达12个行省的任职经历，在云南任职的时间还是相对算比较长的。在云南任上，陈宏谋清正廉洁、敢于任事、干事成事。他革弊政、兴实业、修水利、办教育，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改革运送粮食政策。据《清史稿》记载，陈宏谋在云南布政使任上，改变了远距离运送粮食劳民的做法，改为“转搬递运”，方便了百姓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另据《培远堂文微》载，“耗羡归公”政策，雍正二年(1724年)即在全国推行，陈宏谋到任云南时，个别地方还有苛派情况。对此，陈宏谋明令，如有官员不严格执行“耗羡归公”，必定依法严惩。他以务实清廉公正的作风，打通了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增进了民生福祉。

发展云南铜业。清代，滇铜非常有名，陈宏谋在云南任上务实推进铜业发展，开采新的铜矿，允许百姓贩卖余铜，不仅增加了铜的产量，也活跃了云南经济。此举，不仅实现滇省原铜的自给，也有效保障了当时全国对铜的需求，因为清朝铜钱是流通货币，云南铜业的发展，为稳定清朝的经济金融作出了贡献。

大力兴修水利。云南容易春夏旱涝，对于当时以农为本的清朝而言，要发展农业带动农民增收，保障赋税征缴，兴修水利就特别重要。因此，陈宏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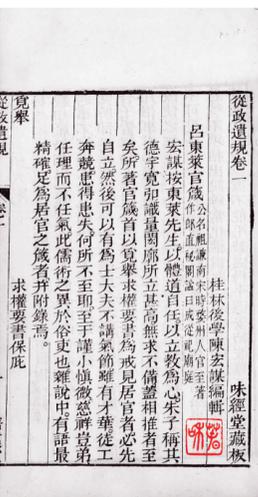
《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封面

在云南任职期间尤其重视水利建设，疏浚渠道、加固堤防，新建水利设施，增加库塘蓄水，要求“水无遗泽，地无旷土”。这些措施不仅扩大了灌溉面积，同时也增加了可耕种土地，为解决农民温饱提供了保障。

发展教育事业。清代云南属僻壤之地，增强边地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教育非常重要。根据《岭南大儒陈宏谋》一书资料，陈宏谋在云南任职时非常重视教育，筹办义学，制定了《义学条例》，要求各州县都设书院，不分民族一体培养。他自己还捐资给昆明呈贡的52所义学，购买学田作为办学费用。对此，《清史稿》给予高度评价：陈宏谋“在云南，立义学七百有奇，教之书”“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

清代中国的陈宏谋，也是世界的陈宏谋

为什么说陈宏谋是世界的呢？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认为，18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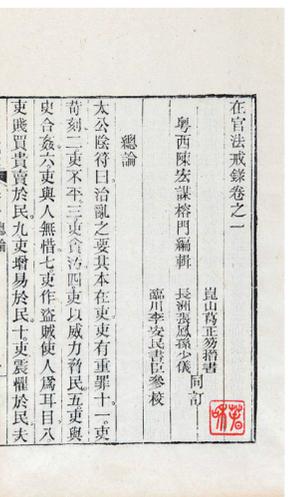


陈宏谋编辑的《从政遗规》书影

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思想观念层面与西方是并驾齐驱的，陈宏谋就是一个例证。

根据国内学者王笛对罗威廉该书的总结和评价，在文化领域，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的认识，基本观点与启蒙时期欧洲学者相似；在经济领域，陈宏谋支持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原则，将土地等的所有权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观念；在政治领域，陈宏谋强调行政的标准化，加强沟通、提高效率，这也是当时欧洲逐渐形成的观念。

事实上，清朝立国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变得频繁，传教士、商人等的涌入，加深了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东西方之间，精英群体在思想观念上不可能没有共通之处。此前以停滞论解释近代为什么会落后，似乎有以结果推导原因的嫌疑。已故著名清史学者高王凌教授曾有更为大胆的观点，那就是中国早在18世纪就已开始现代化，主要特征是人口的增长、政府的加强、发展工业、农业的多种经营等。如果罗威廉、高王凌的观点成立，



陈宏谋编辑的《在官法戒录》书影

对近代中国落后原因的分析，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都可能被颠覆。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历史，意味着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宏谋之所以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在他清廉为官、实心任事期间笔耕不辍，对家国天下的思考。这些思考跨越时空和地域，展现出更久远的生命力。

作为一名清朝官员，陈宏谋对今天的启示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陈宏谋病逝，享年76岁，“命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恭”。这样的待遇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讲，算非常高的了。200多年过去了，陈宏谋的事功是当时当地情境的产物，不可能原样复制。那么，对于陈宏谋这样一个清朝的官员，今天可以向他学习什么呢？

一是要一清二白。陈宏谋一生清正廉洁，不仅在云南任职时如此，在其他省份和岗位上也是如此，不然也不会被后世尊为清官廉吏的典范。为官之人手握

权柄，清廉一时一地容易，清廉一世就比较难。如何才能做到一世清廉？陈宏谋认为就是要心存法戒。他在《在官法戒录》序言中说：“天下之人，无过善、不善之两途。而人之慕善而远不善也，则不外于法戒之两念……见善者而以为法，见不善者而以为戒也。”照今天的话讲，就是对好的人与事要引以为戒。

二是要干事成事。陈宏谋离开云南后，在全国多省任职，均能根据实际直言上疏，秉持一颗为国为民的公心，这是他干事成事的关键。当下，有的干部抱着“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做事”的错误态度，当起了太平官，少了担当精神。须知真金不怕火炼，只要自身过硬，何必担忧流言蜚语，况且我们从从执纪的同时，也要建立了相应的容错纠错机制。更重要的是要明白当官为了什么，基于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必然会想干事，如果能做好干事、不出事，这样的干部就是好干部。

三是要坚持治学。中国古代，学者和官员常兼于一身。《清史稿》载，陈宏谋为官，每到一处，下车伊始，就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世情民情，不断向实践学习，向生活学习，认为“仕即学也”。对今天为官而言，社会变化和技术迭代都越来越快，要想干事成事更应该加强学习研究。坚持治学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要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加强所从事领域的专业学习，也要立足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制定科学合理施政举措。

四是要放眼世界。陈宏谋所处的时代，对世界眼光要求并不高，他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不仅因为他卓越的政绩和他的清正廉洁，更因为他有关人与社会的思想。这也提醒当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于云南地处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前沿，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既要有地域意识、国家意识，也要有世界意识、全人类意识。

从政为官者，如果在任上干出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在履职尽责的同时能进行理论思考，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有所建树，形成一点真正有价值的理论，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故曰：为官当如陈宏谋！(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新闻学院)

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王锡裘： 高风亮节 正气千秋

李凯 胡晓霞

“翠柏高风昭后世；苍松劲节励来人。”云南大学东陆校区风节亭上的这副楹联，正气凛然。此亭以“风节”命名，是为了彰显一位廉洁奉公、为国为民的儒臣——明末大学士王锡裘。

王锡裘(1598—1647年)，字龙藻，号昆华、仲山、念昔，别号素斋，云南省禄丰县(今禄丰市)人。明代天启进士，曾任礼部、吏部、兵部侍郎和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辅政三朝而风骨弥坚。王锡裘是清代列出的滇南五名宦之一。曾有人对王锡裘这样评价：“相国王公真人杰；千秋正气英且烈。”

王锡裘在朝任职时，公正廉洁，敢批“逆鳞”，挺身上疏。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军攻破遵化，越过蓟州等地，并用反间计让崇祯皇帝把兵部尚书袁崇焕投入监狱。王锡裘极为痛心，挺身上疏为袁崇焕辩冤，惹怒崇祯，险些获罪流放。然而，在边事危急等关键时刻，朝廷急需人才，他依然屡屡提出有违帝王心意的意见，为国举贤，先后上疏请求召回陈子壮、顾梦麟、阮元璐、文安之等良臣为朝廷所用。

王锡裘刚正不阿，憎恨奸邪，敢于和奸佞小人作斗争。面对东厂的恶行及宦官头目，王锡裘不畏强权，直言疏请撤销当时权势正盛的东厂，引来东厂极度不满。王锡裘还上疏斥逐进京入觐、妖言惑众的“天师”张应京。虽然知道崇祯皇帝未必会采纳自己的意见，王锡裘从未停止上疏直谏，充分体现了他坚守正义、不畏强权的风骨。

王锡裘家道殷实，家学渊源深厚。家族内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培养了一批仁人志士，在朝为官的族人清正廉洁，在乡为绅的族人恤民情，得到百姓拥戴。其父王功士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乡绅，在乡多有善举。王锡裘自幼随父攻读，勤奋好学，乐善好施。在乡里，他经常周济穷苦百姓，为没有住房的贫民建义宅，资助穷苦之人婚嫁嫁娶，还主动帮助埋理暴露荒野的骸骨。王锡裘还兴办教育，在乡里建盖书院，让孩子们有学可上。王锡裘在朝为官，则心系民间疾苦，进谏请求朝廷减少赋税征派，同时严查严惩侵吞粮饷的官吏，减轻农民负担，使百姓安居乐业。

禄丰是盐县(今黑井镇)五井盐运到省城昆明必经之路，王锡裘看到每逢雨季，盐运就被禄丰东河所阻，便出资在河东上倡建了一座石拱桥“飞虹桥”，既畅通盐运，又方便城乡往来。后来，此桥被洪水冲毁，其子王咨翼继承父志续修完工，取名“丰裕桥”。此桥历经300多年几度翻修至今仍在使用，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明王朝终结。王锡裘虽深知大势已去，但仍然变卖全部家产，招募义勇，准备到福建保卫南明小朝廷。正值土酋沙定洲暴乱，沙定洲将王锡裘及家人围困在省城贡院，王锡裘终日在贡院风节亭枯坐，以度艰苦岁月，遂作《风节亭恭记》并赋诗三首，以明其志。因王锡裘坚持“誓不与贼俱生”，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被杀害。两年后，南明永历王朝对王锡裘进行优抚，赠其谥号“忠节”，后又加谥“文毅”，史称“王文毅公”。而他的精神也深深影响了后世子孙，儿子王咨翼在朝为官也一直谨记父亲的谆谆教诲，修身立德、勤政爱民。

王锡裘一生刚正不阿、为国为民，事迹广为传颂，垂范后世。辛亥革命后，当时名人蔡锷、李根源、赵藩等，为王锡裘立祠堂，题写匾联，立碑作记，备极颂扬。王锡裘归葬禄丰市城东的公鸡山，墓联“风节同山河并壮；文名与日月争光”，正是对王锡裘一生功业及其精神力量的写照。

(作者单位分别为：禄丰市人大、禄丰市纪委监委)



云南大学重建的风节亭

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
云南日报
云南廉政研究中心

本版主编：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投稿邮箱：
ynrb-llb@yndaily.com ynn001@139.com
联系电话：0871-64162931 64195021
阅读理论文章请扫码进入云南理论网